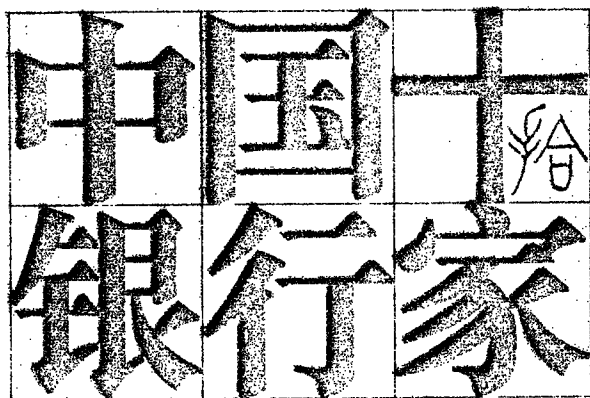






中国
十
银
行
家

中国近代银行家的灿烂与苍凉

——代前言

徐 矛

“银行家”这个字眼，许与“高贵”、“富有”同义。

“当旅客走近几乎任何一个美国城市时，他在地平线上可能望到的第一所建筑物，就是当地银行的总管理处。”美国记者马丁·迈耶的《银行家》一书这样开始了他的记述。

的确，从高大、华丽的建筑物中走出来的银行家，总是既庄重，又矜持。既然当代金融资本日益控制着工、商各业，影响着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向和规模，银行家怎会不表现出自命不凡、睥睨一切的气概！银行家手中的权杖是如此使渴望得到贷款的企业家震动，于是银行资本又具有了某种道德的力量。马克思曾经赞赏地援引过如下一段文字：“银行制度是宗教的道德的制度，青年商人往往由于害怕被银行家的警戒的、非难的眼睛看见而不敢结交吃喝玩乐的朋友。他渴望得到银行家的好评，总是表现得规规矩矩！银行家皱皱眉头，也比朋友的忠告作用更大。对他来说，银行家的话比牧师的话更重要。”

自然，银行家决不以拯救灵魂为职业。银行家所追求的是金钱的“信用”。他们运用近代发达的信用制度，将大量社会资金集

中于自己手中,再贷给有信用的工商业家,使自己获得巨额利润。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金融资本不满足于放贷流通,而向产业资本渗透,形成由金融寡头所控制的大财团。外国银行家们在世界舞台上高潮迭起的演出,吸引了大批中国青年去那里学习。他们被摩根、洛克菲勒、三井、大仓等财团的发展史所激奋,不少人带着“摩根梦”、“三井道路”回到中国,开始了他们在国内银行界的创业之路。

国人自办银行比西方晚了二百余年。首家华资银行——官商合营的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设立于上海。最早的私人资本银行是1906年周廷弼创办的信成银行,继起者有浙江兴业银行和四明银行等。表明由外资银行把持中国金融领域的局面已告突破。

国内银行的发展有两个突进时期。一是20世纪初年,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激发了国人的自强意识,民族工业蓬勃兴起。举办工业需要大量资金,开设银行以集中各方游资就是产业高潮引发的必然结果。到1911年,全国已有华资银行16家,外资银行对中国广泛设立的钱庄业的控制已被削弱。华资银行发展的第二个突进时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的十年左右时间,这既是民族工业也是民族银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当1925年前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时,全国华资银行已达158家,它在三大金融势力(华资银行、外资银行、中国钱庄)中的领先地位已告确立。此后,华资银行业进一步发展,到30年代,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金融网络,即以四行(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两局(中央信托、邮政储金汇业)为中心的国家金融体系;为数众多的商业银行与钱庄构成的都市金融体系;以省市银行及县银行为动脉的地方金融体系。这一套金融网络,是同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的情况相适应的。在这一金融网络中,有28家银行长期被公认为中国的著名银行,它们当中有中央、中国、交通、“南三行”

(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亦有与新华信托储蓄合称为“南四行”的)、“北四行”(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小四行”(中国通商、四明、中国实业、中国国货),以及著名的地方银行——四川聚兴诚银行。中国知名度最高的银行家,都是在它们当中孕育出来的。

在以势压人的外国银行和盘根错节的旧式钱庄两者的夹缝中,艰难地生长起来了中国第一代银行家。他们掌握了现代金融知识,有远大抱负和开拓精神。有过受辱于外国银行的经历的中国银行家,具有民族感情和爱国情怀,他们中不乏支持民主、追求和平与正义之士。中国首家私营银行甚至因在辛亥革命时支持沪军都督府而破产。

银行家中的代表人物,一般认为应推中央银行的宋子文与孔祥熙,中国银行的宋汉章与张嘉璈,交通银行的钱新之与胡孟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陈光甫,浙江实业银行的李铭,浙江兴业银行的叶景葵、徐新六与徐寄庾,金城银行的周作民,盐业银行的吴鼎昌,中南银行的胡笔江,大陆银行的谈荔孙,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的王志莘,四明银行的虞洽卿,四川聚兴诚银行的杨粲三等。其中张嘉璈、陈光甫、李铭、钱新之被称为“四大名旦”。

中国首批银行家,多数受过现代高等教育,不少人还留学外国,掌握了西方现代金融知识。以本书正文及附录所载 110 名银行家作统计,曾留学外国者 48 人,占 43.6%,其中以留学日本者为最多,共 22 人,占 20%(如张嘉璈留学日本庆应大学,攻读货币、银行学;钱新之入日本神户高等商业学校,专攻财政学;李铭和徐寄庾入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学习银行学;吴鼎昌和谈荔孙就读于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攻读银行经济;周作民曾求学于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留学美国者次之,共 17 人,占 15%(如宋子文曾先后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经济;陈光甫在美

国宾尼法尼亚大学获商学士学位；王志莘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留学英国者又次之，共6人（如徐新六在英国获两所大学的学士学位）。此外为留法、德等国者。

当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时，中国人还不懂得怎样管理和经营新式银行，只得实行“用人办事以汇丰为准”的原则，并聘用一名来自汇丰的英国人为“洋大班”（经理），由他掌握银行实际经营权力。中国通商银行还参加了上海外国银行公会，跻身于“外滩银行”之列。直到掌握了西方金融知识的中国留学生陆续归国，在华资银行业中一献身手时，才从真正意义上打破了洋人垄断的局面。

近代银行家，极少是从钱庄业者直接转化过来的。因为银行与钱庄在经济运用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和信用形式。银行是西方资本主义大生产条件的产物，注重恪守现代信用规范，放款必须严格履行制度，提供铺保和抵押品，而中国商人心理则认为提供抵押品颇碍面子。钱庄虽也有制度，但较重人情，常因人而异，注重历史上的关系，采取灵活通融的做法。两者深刻地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和文化背景，这使得钱庄业者不易直接向银行家转化。钱庄出身的王志莘由于留学美国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当然，事物终非绝对，某些例外是会有有的。胡笔江由钱庄学徒发迹就是一例。但论者认为，其原因与其说是经济的，毋宁说是他善于利用政治际遇。

崛起的中国银行家大都比较年轻。周作民、谈荔孙、钱新之、陈光甫、胡笔江等人在银行界崭露头角时均刚30岁出头，而当世人认识银行家张嘉璈、李铭时，他们都才20来岁。本书附录所载100银行家，诞生于1880年以后的为73人，他们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或稍后投身银行界时，年龄均在二三十岁之间。正是这一代人，通过艰难的创业，以二三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银行家们二百多年所走的路程。

金融资本干预国家政治(即西方政治学家所说的政治参与行为之一),是西方的常见现象。最通常的做法就是对选举施加影响。就连政治家也发出抱怨:“银行总是走在我们前面大约两年之久。”

中国的银行家们与政治的关系怎样呢?曾经慨叹“接近政治如玩火”的陈光甫,却终生以“玩政治”而获益。他在对付地方军阀时打“蒋介石牌”,后来在对付蒋介石本人时又打“美国牌”。中国的早期银行家与政治有一个痛苦的“磨合”过程:先是政府、军队对银行强行摊派、索取和银行对摊派、索取的抵制;继之是政府改强行摊派、索取为发行公债,银行对政府公债争相认购;最后表现为银行对政治力量的选择,它们以提供财政支持的方式选择蒋介石而抛弃反蒋势力。

30年代有一名西方记者说,中国的公债是一根神奇的香肠,它的一端养活了政府军队,另一端喂肥了银行家。当蒋介石停止采用威胁、绑架等勒索钱财的方法代之以发行公债时,银行家立即趋之若鹜。这些公债以大利息高折扣吸引了所有银行。如1927年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月息七厘,1931年的关税短期库券月息达八厘,均以五折计值,即银行仅需付出公债票面一半的钱,到期不但能收回票面的金额且获得七厘(或八厘)的高额利息。从1927—1931年,南京政府共发行10.5亿元公债,而政府实际收入仅5.38亿元。银行得益甚丰,全国28家重要银行是经营公债的大户,获利自然极厚。在经营公债前的1927年,它们的总资产为14亿元,到1931年猛增到26亿元,增幅达85.7%。由于经营了公债,银行家们当然十分关心南京政府的稳定性,于是他们就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政府牢牢拴在一起。政府也设法把银行家们笼络到各种“委员会”中供职。陈光甫被任命为全国经济委员会与全国航空建设会的委员,以及棉业统制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谈荔孙、胡笔

江均为全国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委员。徐寄庾除担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外,后来还成为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一直活跃在银行界与政界之间、充当银行业代表人的李铭,更是一身兼任财政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最高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全国航空建设会等机构的委员。至于吴鼎昌、张嘉璈、钱新之,则索性到南京政府中做官去了,这三人也成了国民党内政治派系之一——新政学系的重要成员。

银行家对政治的态度,在1931年底的政府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当时,蒋介石被挤下台,孙科组织新政府。因财政困难,孙科寻求银行界支持,遂与张嘉璈(代表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秦润卿(代表上海钱业公会)、李铭(代表“偿债基金委员会”)、杜月笙(代表“债券持票人会”)等人谈判。银行界只允每月借给政府八百万元。广州报纸认为,这是上海银行界在逼孙下台,“它贷给政府区区八百万元,而在1931年认购了蒋介石四亿元债券,把两者加以比较,难道是可以原谅的吗?”30天后,孙科被迫辞职,还政于蒋介石。

并非所有的银行家都甘于依附四大家族。他们当中不乏为人刚正、不依附强权、要求按照金融业自身规律行事的人。浙江兴业银行的叶景葵就是其中之一。他尽可能远离政治,与四大家族关系疏远,因此遭到四大家族的排挤打击,这家曾先后五次以储蓄额在商业银行中居第一的著名银行,自1935年起渐趋衰落,不但钞票发行权被取消,发行准备金也被迫上缴,从此实力大减,盛况不再。

中国早期银行家曾雄心勃勃地想走西方大财团之路,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结合工矿、航运、商业等,形成大的金融资本集团。那些留学归来的年轻银行家们,无不做着财团梦。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他们的梦想难以成真。

20年代,中国曾有过三大财团:华北财团、江浙财团和华南财团,但那仅是由地域经济利益的某种一致性所构成的松散的集合概念,不是规范意义上的金融资本集团。而且三大财团的区分也是变动的,当全国金融中心南移至上海后,原属于华北财团的“北四行”便把总部移到上海,北方金融势力的代表人物钱新之被蒋介石延揽入上海财政委员会,南方金融势力的活跃人物李铭被“北四行”聘为“四行储蓄会”副主任,两大财团相互融合,原来的地域集团概念有所淡化。由此,当人们论及江浙财团的构成时,也把“四行准备库”、“四行储蓄会”列进去。近人亦把吴鼎昌、周作民列为江浙财团成员,可见上述三大财团的划分在一定意义上实为模糊概念。

银行界曾有过联盟之举,1921年吴鼎昌发起,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银行于次年组成“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1922年张嘉璈发起,成立以中国银行为首的中资银行集团,以1600万元巨款参与铁路建设;以及“一二八”事变后28家大银行组成共渡时艰的超大型银行集团等等形式,似都不能看作是中国银行家们筹组大财团之始,因为无论就其规模、结合范围及结构形式,都离建立财团的第一步相去较远。即拿“北四行”来看,对外名曰四行联合营业,实际仍各自为政;遇到挤兑风潮,便都把麻烦推给中南银行;获得重大经济情报却从自身利益计而互相保密,都是这一联合体继续发育的障碍。

打破国内银行家们“财团梦”的,主要是国民党的金融垄断。国民党利用手中的行政与经济强权,一面建立“四行”“两局”的金融垄断体制,一面不择手段地攫取私人金融资本。中国银行原是一家官商合营、以商为主的大银行。国民党当局为加强对它的控制,便大量增加官股成分。1935年,财政困窘的国民党当局以尚未上市的金融公债券抵充现金2500万元,为官股股金,使官股在中国银行中的比例由原先的20%一下子增加到50%。国民党不

花一分钱的现金,便取得了中国银行的控股权,从而很轻松地将原来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一律撤换。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历史上的首家银行。国民党当局对它的攫夺手段极为残酷。先是,通商银行于1934年以210万元巨款在上海建造一幢十七层营业大厦。1935年,通商银行因被四大家族金融垄断体制压迫而亏损严重,以150万元的低价卖给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四大家族垄断工矿投资的机构。通商银行收到150万元不久,国民政府财政部又要通商银行向中国建设银公司认购卷烟印花税票160万元。通商银行不但将这笔刚到手的房款全部吐出,还赔上10万元。1937年,通商银行收回这批税票的本息100万元时,又被告知须再购税票100万元,分17个月归还。通商银行的这幢大厦就此半卖半送地落入四大家族之手。同年,通商银行被迫改为官商合办,被四大家族所控制。同时,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广东银行等有相当实力的商办银行亦均被四大家族吞并。全国各商办银行都被蒋介石政府的无休止挤榨弄得苦不堪言,就连李铭都在私下说要对政府“敬鬼神而远之”。到1938年为止,在全国147家商办银行中,资本总额的60%以上已为四大家族所占有。私人金融家们岌岌乎自危,虽然没有人再像杨希仲(四川著名金融家)那样因理想破灭而自尽,但昔日的财团理想只得彻底放弃。

中国近代银行家们对中国经济与社会进步曾经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的银行资本的产生比工业资本晚了近30年。因此可以说银行资本是应工业资本的急切呼唤而出现的。从总体上看,中国金融资本与工商业资本的关系,不是西方发达的金融资本与工商资本那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不是金融寡头对工商企业的那种从渗透到垄断直至并吞的对立关系。由于中国金融资本与工商资本同处于外国资本和中国封建买办势力的侵害、倾轧的大背景

下,两者身受相同的威胁,因而形成了休戚与共、共存共荣的经济联系。明智的中国银行家把扶助民族工商业当作自己的“天职”。周作民在创办金城银行之初就提出:“银行与工商业本有绝大关系,工商业发达,银行始可发达,故银行对于工商业之投资,自系天职。”陈光甫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所定的业务方针是“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中国银行是最早开办外汇业务的华资银行之一,张嘉璈认为要发展外汇事业,必须扶助工商业。他说:“欲经营国际汇兑,非发展国际贸易不可;欲发达国际贸易,非发达国内贸易不可;欲发达国内贸易,非辅助工商业不可。”

为了支持民族工商业与外商争夺市场,为了在外货倾销面前维持民族工商业的生存,各华资银行作出了种种努力。浙江兴业银行向数百家企业放款,其中有二十余家在破产边缘得到解救。民族资本家刘鸿生曾多次说:“浙兴是我们自己的银行。”有一个时期,荣氏集团的企业被外资(主要是日资)企业挤得走投无路,是中国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及时放款,才使它们能维持生机。为了扶助工商企业,一些华资银行调整了原有资金投放顺序,增加对工商企业放款的比例。金城银行原先把招揽对政府的放款放在首位,后来将它降至第五位,而占第一、二位的分别是工矿业和商业。它对工矿业和商业的放款,1927年比1919年增加了四倍半,而在这同一时期中,存款总额的增长为二倍半。对工矿业和商业放款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存款的增长速度。其他华资银行的情况亦与金城相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华资银行组成银团,以庞大的资金支持国家重大建设。如抗战前几年,为加速兴建具有战略意义的浙赣铁路,由张嘉璈牵头,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中国农工、金城、上海商业储蓄、新华信托、江西裕民等多家银行联合集资,贷款数占全路总工程费用的60%。随后,为兴建钱塘江大桥以贯通南北交通,由浙江兴业银行牵头,中国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等组成银团参加投资。这两项工程都赶在抗战爆发前建成,民族金融家们

功不可没。

中国第一批银行家们是我国银行近代化的积极倡导者。他们引进并消化吸收了外国银行的经营管理方法,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形成了一套中国式的银行制度与风格。谈荔孙回国后,应张謇之邀在南京办起了中国第一所培养新式簿记人才学校。后来各银行中的簿记人才基本上都是谈荔孙的学生。

由中国土地滋养起来的中国首批银行家,熟知中国社情民风,他们所创建的银行,透出了不同于外资银行的文化气息。最主要的不同就是华资银行家们提倡服务中国社会,有的还提出“顾客是衣食父母”(陈光甫),“顾客是永远正确的”(张嘉璈)。这种独特的服务文化是上海外滩的外国银行家们所不能为也不屑为的。

当年的外资银行,无不巍峨壮观,气派非凡,使中国普通百姓望而却步。早年曾在外资银行受到白眼的陈光甫,在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认为银行必须使老百姓敢于进门。他规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及各分理处,门面不能太高大,装饰不能太富丽,以免广大小额存户见之自惭形秽。

“服务社会”成为华资银行普遍的信条。他们在七、八十年前所设立的各种灵活方便的储蓄种类,不少至今仍被采用。

“一元开户”是当时的一项震聋发聩的举措,首创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私营银行——信成银行。为了打破中国平民对银行的神秘感和疏远感,该行在距今八十多年前提出了这一吸引储户的措施。开始曾被外资银行所讪笑,但迅速在众多华资银行家中引起共鸣和响应,而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最后连一直放不下架子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也采用了。

陈朵如在浙江地方实业银行采用“零存整取”储蓄方法,客户每月存入一元,15年后可支取本息 504.66 元。这项储蓄吸引了广大下层民众。

谈荔孙针对当时社会动荡、民众对未来生活深表忧虑的情况,

推行一项“特种定期存款”，客户一次存入 171.51 元，15 年后可得本息 1000 元，深得小资产者的欢迎。

陈光甫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办婚丧嫁娶各种礼券，颇受青睐。

王志莘在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开办存取两便储金、整存零取储金、存本付息储金，并代收牛奶费、水电费、学费等等。

此外，一些华资银行还一改正襟危坐、等客上门的做法，把储蓄办到军队、学校去。如周作民得悉冯玉祥在西北军中号召节约，便及时去西北军办理储蓄。陈光甫派人去大、中学校吸引学生储蓄。

以上形形色色的储蓄方式，完全不同于“外滩银行”只为大客户服务的做法。从此国人对华资银行耳目一新，存储额迅速上升。服务文化，总是既惠人，亦惠己，共同受益。

银行界上层，有几种人。一种是大股东，有的甚至是主要出资人，如大军阀倪嗣冲，占有金城银行开办总资本 50 万元中的 17 万元；大军阀张勋，一人独占盐业银行总资本的 40%。大股东的投资动向，出资或抽资，毫无疑问决定银行的命运，但他们只关心获利大小，对银行业务并不过问，他们只是食利者而不是银行家。另一种是被股东们推出来的董事，他们都是较大的出资人，由他们组成的董事会推出董事长，对银行职能机构实行监督。银行家往往身兼几家银行的董事，但有些社会名流虽被推为董事或董事长，对银行业务并不多加过问，如颜惠庆、李石曾、王正廷等均如是，一般不将他们视作银行家；第三种是银行高层管理者（主要是总经理、经理、协理等），在现代银行制度下，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出资人只食利不管理，管理人则主持日常业务，因此上述高层管理者，对银行布新除旧，精心谋划，掌握着银行的实权。在以上三种人中，一般所称银行家，主要是后两种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最出色的

银行家,往往来自第三种人。君不见庄得之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任董事长,但当人们提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首先想到的却是总经理陈光甫;同样,金城银行的董事长是占有该行总资本20%的王郅隆,而金城的事业却和总经理周作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业绩和影响是我们编撰本书选择传主所本的根据。

目 录

中国近代银行家的灿烂与苍凉——代前言…………… 徐 矛(1)

宋子文…………… 吴景平(1)

求学美国——大革命时期的中央银行行长——出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银行总裁——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创办者——参与攫夺中国银行——苦心经营中国银行

张嘉璈…………… 朱 榕 黄 坚(47)

负笈东渡的浦江之子——民国政坛的“希望之星”——北洋时代的金融奇才——“民国第一理财家”——中国最大银行的总经理——华资银行改革的力行者——强权政治下的悲剧人物——抗战烽火中的政府部长——旧秩序下的殉道者——出走之后：从大亨到学者

钱新之…………… 石 磊(88)

初涉银行界——初露锋芒——整顿交通银行——任职“四行储蓄会”——1927年的政治赌博——中兴煤矿之中兴——秘迎段祺瑞南下——关于所谓中日“经济提携”——抗战期间的钱新之——后期主要活动

叶景葵…………… 潘连贵 范致清(115)

踏上仕途——“金枝玉叶”——结缘金融——署理监督——经营工矿——路股风波——“浙兴”生涯——纾家兴馆——“十老上书”——鞠躬尽瘁

陈光甫..... 姜天鹰(141)

“小小银行”的诞生——在夹缝中求发展——诚信·稳健·创新——
“银行是我，我是银行”——“接近政治如玩火”——难解的“美国情
结”——归向何处？

李 铭..... 郑泽青(183)

东洋归来的接管大员——在抗拒“停兑令”中崛起——策动官、商拆
伙——浙江实业银行：别具一格的管理——面向洋行大班的经营策
略——“取蛋必先养鸡”——致力于银行经营的现代化——大洋彼
岸的银行使节——“与狼共舞”最后一曲

吴鼎昌..... 马长林(225)

从洋进士到政府阁员——开始金融生涯——“北四行”之崛起——
主持四行联合储蓄会——兴建远东第一高楼——接办《大公报》十
年——虎头蛇尾的废止内战大同盟——短暂的实业部长经历——
边省七年主政——黯淡的结局

周作民..... 顾关林(263)

初显身手——创立金城——实施手腕，发扬信誉——北国之雄——
知己——审时度势，善借机缘——更上一层楼——应变有方——灰
色的迷惑——走麦城——春晓游人归

谈荔孙..... 赵 刚(313)

负笈东瀛求学识——维护信誉抗“停兑”——结交权贵办银行——
稳步经营事业兴——犹豫再三入“四行”——拓展渠道建仓库——
货畅其流办外贸——欲展宏图建商场——天不假年梦难成

胡笔江..... 黎 霞(344)

介乎民子——“交行”一秀——创立“中南”——同气联枝——苦
心经营——祸不单行——投靠宋子文——执掌“交行”——拳拳爱
国心

附录：一百银行家小传..... 黎 霞(372)

后 记..... 徐 矛(430)

宋子文

吴景平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大权独揽,予取予夺,任何人都得唯命是从。但是中央银行的首任总裁,为了维护国民党整体利益,对于蒋漫无计划的开支,敢于拒绝,敢于抗争,有时甚至拍案而起,弄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他就是宋子文。

求学美国

在民国时期的银行界,宋子文可说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人物。他虽然直到本世纪20年代才开始在金融界崛起,但他的地位、影响却超过了其他银行巨子。

宋子文于1894年12月4日出生在上海(祖籍广东海南),1971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去世。他的父亲宋耀如是个基督徒,早年曾赴美国,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教育和宗教精神的影响。母亲倪桂珍自幼年起便是个新教徒,毕业于上海西门培文女子学校。宋子文的两个姐姐宋蔼龄、宋庆龄在赴美留学前,都在上海中西女塾(即马克帝耶女子学校)就学;宋子文则求学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预科部,为日后留美作准备。在蔼龄、庆龄赴美之后,宋家对于作为长子的宋子文,已明确了留美目标,而圣约翰大学,当时则被视作接受留洋前